追蹤王英明《曆體略》：日本兩本順治三年重刻本考

徐光台
國立清華大學
榮譽退休教授

提　要

開州舉人王英明（?-1614）約於萬曆三十七年（1609）隨知府李之藻學習西學，四十三年病逝。其為子準備科舉考試而留下的《曆體略》手稿，是當時士人併合中西曆體知識的一本罕見作品，崇禎十二年（1639）由其次子王懿在襄垣令內於山西初刊。明清鼎革，王懿於弘光朝覆亡後降清，當其於順治三年（1646）夏以御史身分到虞山巡視蘇松漕運時，毛晉為其重刻了《曆體略》。

筆者先前追蹤海峽兩岸現存的六個順治三年刊本，本文進一步追蹤日本的兩個順治三年重刻本，並追溯它們進入日本的歷史與彼此間的關聯。靜嘉堂文庫於一九〇七年收購陸心源所藏漢籍古書時購入《重刻曆體略》，它與臺北國家圖書館是現存唯二具有汲古閣梓內封題的刻本。東北大學藏本則是晚年對和算史深感興趣的藤原松三郎（Fujiwara Matsusaburo, 1881-1946）於一九四〇年購入。藤原松三郎曾多次赴靜嘉堂文庫比較日本的二藏本，並在其藏本上留下四項覆寫或手寫的批註資料，呈現出兩本間的差異與關聯，並令此成為一個跨越出版史、收藏史與閱讀史的罕見案例。

關鍵詞：王英明、王懿、汲古閣、重刻《曆體略》、靜嘉堂文庫、東北大學、藤原松三郎

一、前言

王英明（?-1614），字子晦，自號太常吉星，開州澶淵（今河南濮陽）人，生年不詳，只知他於明萬曆三十四年（1606）於順天府中舉。[1] 李之藻（1565?-1630）於三十六年十一月就任開州知府後，傳播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引入的西學，影響王英明隨其學習，[2] 完成《曆體略》手稿，不幸於四十三年病逝。[3] 十七世紀初，正值西學首次大規模東漸，中西兩種自然知識傳統遭遇，王英明《曆體略》成為明末首本中國士人間學習西學下的作品，因此有關此書的起源、發展、刊刻、版本、收藏與影響等，都值得注意與研究。

二十世紀中葉以前，除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介紹王英明《曆體略》以外，似乎未見任何研究。[4] 一九六六年方豪（1910-1980）提出王英明《曆體略》受李之藻影響。[5] 近二十年來，學界陸續出現一些對《曆體略》內容的分析研究。[6] 十多年前，筆者在臺北國家圖書館查閱館藏清順治三年汲古閣刊刻重刻《曆體略》微捲，未見趙士春序的首頁，於是開始尋訪此書是否有其他善本，展開對此書多面向的追蹤研究。

首先從外史角度完成〈明清鼎革之際王英明《曆體略》的三階段發展〉，探究此書從萬曆四十年手稿，經過崇禎十二年初刊，到清順治三年重刻的三階段發展。王英明為幫助兒子治《尚書》之舉業而撰《曆體略》，原本無意出版。但其於崇禎十一年（1638）出任襄垣令的次子王懺，為了顯揚其父，乃在翌年於山西平陽自費初刊此書。一六四四年初李自成（1606-1645）民變，襄垣淪陷，王懺逃難時隨身留有一本倖免於戰火。南遷考選弘光朝御史，翌年五月降清。順治三年（1646）

1 （清）祁德昌編修，陳兆麟纂，《河北省開州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清光緒七年刊本影印），卷 5，〈選舉〉，頁 20b(總 634)。

2 方豪，《李之藻研究》（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頁 197。

3 （明）王懺，〈曆體略序〉，收入（明）王英明，《重刻曆體略》，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清順治三年毛氏汲古閣刊繡梓本。如果不特別提到其他刻本時，本文主要使用臺北國家圖書館藏《重刻曆體略》。

4 紀昀等總纂，四庫全書研究所整理，《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整理本）》上下 2 冊 (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 106，〈子部 16〉，〈天文算法類 1〉，頁 1394。

5 方豪，《李之藻研究》，頁 178、199。

6 石雲里，〈曆體略提要〉，收入薄樹人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彙．天文卷》第 6 冊（鄭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頁 1-3；陳美東，《中國科學技術史．天文學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王英明與《曆體略》」，頁 637-638；游博清，〈王英明《歷體略》初探〉，《科學史通訊》，2007，30 期，頁 12-20；龐乃明，〈晚明時代的河南士人與西學——以王英明及其《歷體略》為中心〉，《明史研究》，2011，第 12 輯，頁 222-230。

夏，他到虞山巡視蘇松漕運，因其特殊的政治身分影響汲古閣毛晉（1599-1659）幫其重刻《曆體略》。[7]

其次從文獻分析觀點，撰寫〈王英明《重刻曆體略》順治本考證〉一文。根據海峽兩岸現存六本順治三年刊本，包括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本、北京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本、[8] 北京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圖書館藏本、[9] 浙江大學圖書館藏本、[10] 上海圖書館的足本與殘本 [11]，其中總共有王英明〈曆體略序〉（1612, 1639 年增子嗣資料 , 1646 年再補增子嗣資料）、屠象美〈曆體略序〉（1639）、王懺〈曆體略序〉（1639）、趙士春〈重刻曆體略序〉（1646）、王曰俞〈重刻曆體書序〉（1646）、翁漢麐〈敘〉（1646）、錢明印〈曆體略序〉（1646）、王懺跋（1646）、吳偉業〈曆體略序〉（1646）等十一篇序跋，對六刻本進行考證。認為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本為汲古閣正式刊本，上海圖書館藏足本是最晚的，其餘四個為變異本，皆由於王懺到常熟巡視蘇松漕運，停留短暫，吳中士人乃倉促分工下衍生的結果，數日內完成重刻《曆體略》，使此書成為以汲古為名的汲古閣出版史中例外的例外，未列入汲古閣校刻書目中。[12]

此外，筆者發現方孔炤（1591-1655）在《周易時論合編圖像幾表》有一節名稱為「崇禎曆書約」，後人誤認為它是《崇禎曆書》的約略或概要。筆者發現其內容大量引用或改寫王英明《重刻曆體略》。 順治三年汲古閣重刻《曆體略》時，增訂的補註中提到《崇禎曆書》，誤導方孔炤認為他採用的《重刻曆體略》內容來自《崇禎曆書》的概要，因而名為「崇禎曆書約」。[13]

友人韓琦先生知曉筆者在追蹤王英明《曆體略》善本，二〇一二年七月在日本東北大學圖書館看到《重刻曆體略》有三項手抄批註資料，告知筆者並惠示拍攝圖片，引發筆者於二〇一三年七月前往追蹤。行前檢索日本多所圖書館藏漢籍目錄，

---

7 徐光台，〈明清鼎革之際王英明《曆體略》的三階段發展〉，《故宮學術季刊》，26 卷 1 期，2008 年 9 月，頁 41-74。

8 王英明，《重刻曆體略》，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本。

9 王英明，《重刻曆體略》，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圖書館藏本。

10 王英明，《重刻曆體略》，浙江大學圖書館藏本。

11 王英明，《重刻曆體略》，上海圖書館藏殘本（缺中、下卷）；王英明，《重刻曆體略》，上海圖書館藏本 (561211、561212)。

12 徐光台，〈王英明《重刻曆體略》順治本考證〉，《故宮學術季刊》，27 卷 4 期，2010 年夏季，頁 45-74。

13 徐光台，〈方孔炤〈崇禎曆書約〉來源新證〉，《自然科學史研究》，29 卷 4 期，2010 年 10 月，頁 404-420。

發現東京靜嘉堂文庫有本《曆體略》，乃前往東京靜嘉堂文庫與仙台東北大學追蹤此二藏本。在京都承武田時昌（Takeda Tokimasa）教授協助，確定它們是日本唯二的十七世紀刻本。[14]

關於善本書的歷史，過去對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 1473-1543）《天體運行論》的研究早已汗牛充棟，金格瑞契（Owen Gingerich）花了三十年追蹤現存初版與二版的哥白尼《天體運行論》，找出相當多的閱讀者與收藏者，為古籍探究提供一個非常生動有趣的案例。[15] 相對地，儘管王英明《曆體略》的知名度與重要性難與哥白尼《天體運行論》相比，它是首本中國士人間學習西學的作品，筆者追蹤此書多年，查閱海峽兩岸現存六本順治三年刻本，如今得知日本有兩善本，乃對它們進行古籍探究的工作，提出以下的問題：它們是如何傳入日本的？二書各自有何特色？它們與先前所知海峽兩岸現存六刻本有何關連與差別？為何東北大學圖書館藏本內會出現一些不同尋常的手抄與批註資料？它們在表達什麼訊息？二書對順治三年版本鑒定與考證，以及重建重刻《曆體略》的出版史有何幫助？為何現存重刻《曆體略》只出現於東亞，未見於歐洲，此點有何歷史意義？

筆者發現：日本現存兩本重刻《曆體略》皆於二十世紀前半購自中國。一本是靜嘉堂文庫於一九〇七年收購陸心源藏漢籍古書而購入，它與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本是唯二具有汲古閣梓內封題的刻本；另一本是晚年對和算史深感興趣的藤原松三郎於一九四〇年購入。筆者還意外地發現東北大學圖書館藏本的夾頁中有第四項手抄資料，它與另外三項手抄批注資料間的呼應，反映藤原松三郎多次赴靜嘉堂文庫，比較此二藏本後，在東北帝國大學藏本中留下四項手抄批注資料，反映二書間的明顯差異與關聯，成為一個跨越出版史、收藏史與閱讀史的罕見案例。

在進行的步驟方面，本文首先介紹東京靜嘉堂文庫藏本的起源與特色，接著的是東北大學圖書館藏本的起源與特色。第四節處理二書間的明顯差異與關聯，最後在結論中分析此二藏本在現存順治三年刻本中的位置，以進一步闡明該年諸刻本的關連與變化，並嘗試說明現存八本順治三年重刻《曆體略》的收藏範圍落在東亞，

14 筆者日本之行曾到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拜訪武田時昌教授，感謝他通過其建立的日本「全國漢籍檢索」目錄，幫助搜尋十七世紀王英明《曆體略》在日本的善本收藏，發現靜嘉堂文庫與東北大學藏本是日本僅有的兩本。

15 Owen Gingerich, *The Book Nobody Read: Chasing the Revolution of Nicolaus Copernicus* (New York: Penguin, 2004). 中譯本見金格瑞契著，賴盈滿譯，《追蹤哥白尼：一部徹底變歷史但沒人讀過的書》(臺北：遠流，2007)。

未見於歐洲的歷史意義。

二、靜嘉堂文庫藏王英明《曆體略》本

日本東京靜嘉堂文庫在一九〇七年購自中國的珍善本漢籍脈絡中，收藏一本王英明《曆體略》，內有七篇序。靜嘉堂文庫目錄記載它是「明崇禎刊（汲古閣）」，[16] 認為它是明版崇禎年間汲古閣刊印本。本節首先介紹它在收購中國珍善本漢籍書脈絡中進入靜嘉堂文庫。其次，從其內容來證明它與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本一樣，同是清順治三年汲古閣正式刊印《重刻曆體略》本。接著探討它的先前收藏者包括葉明澧與朱學勤等收藏家。最後介紹它獨有的一些眉批與手註。

（一）在收購陸心源（1834-1894）珍善本漢籍脈絡中買入王英明《曆體略》

十七世紀中刊印的王英明《曆體略》是如何流傳至日本，為東京靜嘉堂文庫收藏？根據《日藏漢籍善本書錄》記載，「《曆體略》三卷，明王英明撰，靜嘉堂文庫藏本，原陸心源十萬卷樓舊藏。」[17] 顯示它來自中國清代藏書家陸心源十萬卷樓藏書。

陸心源，字剛甫、剛父，號存齋，晚號潛園老人，浙江湖州府歸安（今湖州）人。幼年師從萬青藜（1821-1883，道光二十年進士）、吳式芳與張錫庚（?-1861，道光十六年進士），咸豐九年（1859）中舉。時值太平天國動亂，他隨總兵劉長佑（1818-1887）鎮壓太平軍。同治四年（1865），任廣東南韶兵備道。六年調高廉道。後以丁艱返鄉。十一年任福建鹽運使，雖多次剿平匪亂，卻遭人以鹽務損耗為由參奏，削官去職。返鄉後在歸安城東蓮花莊旁建潛園，內有諸多美景。常與姚宗堪、戴望（1837-1873）、施補華（1835-1890）、俞勁叔等切磋學問。由於太平天國在江浙造成的動亂，迫使許多珍藏書稿求售，為喜愛藏書的陸心源提供蒐購珍藏善本的難得機會，乃在潛園內築皕宋樓、十萬卷樓與守先閣三座樓來藏書，其中皕宋樓藏宋元刻本及名人手抄本，十萬卷樓藏明以後精刻及明清名家稿本與精抄精校本，守先閣則藏明清普通本與尋常抄本，累計收藏達十五萬卷。

在藏書史上，陸心源以皕宋樓聞名，與江蘇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浙江杭州

16 「《曆體略》三卷，明王英明撰，明崇禎刊（汲古閣）。」靜嘉堂文庫編，《靜嘉堂文庫漢籍分類目錄正續編》（臺北：大立，1980 年據日本昭和 5 年 (1930) 今正續編合冊本複印），頁 456。

17 嚴紹璗編著，《日藏漢籍善本書錄》（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 1203。

丁氏八千卷樓、山東聯城楊氏海源閣齊名，被認為是晚清著名的四大藏書樓。同治年間，他掇拾遺文完成《唐文拾遺》與《唐文續拾》。他長於金石，著有《金石錄補》（1886）與《穰梨館過眼錄》（1892），並輯有《皕宋樓藏印》與《千甓亭古專圖釋》等書。光緒十九年（1893），李鴻章（1823-1901）保舉他復職，赴京接受光緒皇帝召見，返鄉途經天津時不幸染疾，次年病逝湖州。其產業由長子陸樹藩（1868-1926）掌管上海振綸繅絲廠，錢莊歸次子陸樹屏（1871-1899），湖州當鋪由三子陸樹聲（1882-1933）負責，四子陸樹彰（1890-ca. 1943）因年幼未參與。陸樹屏於一八九九年搭江輪意外落水死亡後，錢莊亦歸陸樹藩經營。

陸樹藩，字純伯，號毅軒，幼隨父親習畫與版本目錄，亦投身舉業。一八九二年進京，得欽加侍讀銜，任內閣中書本衙門撰文。一八九四年，因父病逝，返鄉丁憂守喪，承繼其藏書，仍繼續收購宋元珍本。在時局動亂的情況下，於一八九八至一九〇二年間曾試圖將父親藏書捐給官方，[18] 未有結果。

一九〇〇年，八國聯軍攻陷北京。為營救身陷北京的南方官商，陸樹藩積極組織救濟善會，並擔任召集人，因財務處理不當，欠下鉅款。另一方面，他經營的繅絲廠面臨極為嚴峻的挑戰。過去湖州生產的絲在貿易上的興盛，卻在十九世紀後半起面臨機器繅絲業興起的挑戰。二十世紀初，日本機器繅絲業生產的絲，在品質優於土絲，銷入中國後，[19] 迫使振綸繅絲廠關閉，牽連提供絲廠資金週轉的錢莊也隨之倒閉。在雙重債務的壓力下，在一九〇四年左右動了出售皕宋樓等藏書的念頭。為了能讓父親的藏書得以集中，避免零星分批售出，於是尋求能整體購入的大買家。

清末民初，甲午戰爭以後，在中日交流中，帶動內藤湖南（1866-1934）、田中慶太郎（1880-1951）、武內義雄（1886-1966）、神田喜一郎（1897-1984）、長澤規矩也（1902-1980）、吉川幸次郎（1904-1980）等日本學人陸續到中國訪查與蒐購漢籍古書。[20] 在此以前，明治年間岩崎彌之助（1851-1908）已於東京近郊駿河臺設館，根據《詩經》「其告維何，籩豆靜嘉」，以其「清潔而美」，[21] 來命名其所創始

18 徐楨基，《藏書家陸心源》(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頁 232。

19 陳慈玉，《近代中國的機械繅絲工業 1860-1945》（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

20 內藤湖南、田中慶太郎、武內義雄、神田喜一郎、長澤規矩也、吉川幸次郎著，錢婉約、宋炎譯，《日本學人中國訪書記》（北京：中華書局，2006）。

21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靜嘉，清潔而美也。」（宋）朱熹集撰，朱傑人點校，《詩集傳》，收入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第 1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 17，〈小雅．既醉〉，頁 681。

的日本收藏漢籍古本圖書最豐富的靜嘉堂文庫（Seikado Bunko），最初以家中舊藏十三經、十七史、通鑑等漢籍為主。一八九九年起至一九〇八年，陸續收購日本國學界耆宿與權威如中村敬宇（1832-1891）、田中賴庸、山田以文（1762-1835）、色川三中（1801-1855）、竹添光鴻（1841-1917）、島田重禮（1838-1898）等人擁有的漢學善本藏書。

一九〇四年左右，陸樹藩有意整批讓售陸心源藏書，接觸到在靜嘉堂文庫任職的島田翰（1879-1915），他建議岩崎彌之助乘此時機整批購買，使其漢籍藏書更為豐富。一九〇六年島田翰受命前往湖州仔細檢視陸心源藏書，完成一份藏書種類與卷數的詳細紀錄。翌年春末，雙方就整批陸心源藏書的價格與交貨過程達成協議，賣給日本岩崎氏靜嘉堂文庫。那年夏天陸心源藏於皕宋樓、十萬卷樓與守先閣的書，被載往上海，轉往東京，進入靜嘉堂文庫，使得靜嘉堂文庫成為日本研究中國古籍的中心。

雖然《皕宋樓藏書志》似未記載本文關切的王英明《曆體略》，[22] 整批交易中有本《曆體略》。根據《日藏漢籍善本書錄》記載，它原是陸心源十萬卷樓舊藏，成為靜嘉堂文庫藏本。[23] 各卷首頁的名稱是《重刻曆體略》。卷上首頁蓋有「靜嘉堂珍藏」直立長方朱印（見圖一），在趙士春〈重刻曆體略序〉首頁首行，有「靜嘉堂珍藏」直立長方朱印與「歸安陸 / 樹聲藏 / 書父記」正方朱印，（見圖二）反映此書在轉給靜嘉堂文庫以前，也就是在蓋上「靜嘉堂珍藏」的刻印以前，已落上陸心源三子陸樹聲藏印，此事背後還有一段故事。

根據《潛園遺事》所記，在島田翰仔細檢視陸心源藏書時，在湖州經營當舖與守著父親藏書的陸樹聲，知道大勢已去，乃刻數印，與管家將印分別蓋在父親的藏書上，以供後人辨識這些書出自陸家。

> 在家中，當時三太公陸樹聲在湖州，島田登樓觀書後，預知此類書必將出售，與管家人李延達合作，在所有秘本書上均蓋上“歸安陸樹聲叔桐父印”、“歸安陸樹聲所見金石書畫記”、“臣陸樹聲”、“陸樹聲印”、“歸安陸樹聲藏書之記”等……為說明這些書原為陸氏所有而蓋，當然其中亦有樹

22 （清）陸心源編，《皕宋樓藏書志、續志》（臺北：廣文，1968）。《皕宋樓藏書志》卷四十八為子部天文算法類，未列王英明《曆體略》，《皕宋樓藏書續志》亦未提到。

23 見註 17。

聲工讀過之書。[24]

根據《靜嘉堂文庫宋元版圖錄》的記載，宋元版藏書十之八九鈐印「臣陸樹聲」、「歸安陸樹聲叔桐父印」等。[25]

（二）靜嘉堂文庫藏本與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本同是清順治三年汲古閣正式刊印重刻《曆體略》本

基於先前對海峽兩岸現存六本順治三年重刻《曆體略》的研究，筆者發現可藉著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本來確認東京靜嘉堂文庫藏本與其年代。

首先是二本具有相同的汲古閣內封面鐫雕牌記。右上方為「澹淵王子晦先生撰」，中為「曆體略」，左下方刻有「汲古閣繡梓」。（見圖三與圖四）

在現存八個重刻《曆體略》刊本中，僅有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本與東京靜嘉堂文庫藏本具有汲古閣內封面鐫雕牌記，反映它們是毛晉答應王懺重刻《曆體略》時的正式刻本，因此才有汲古閣繡梓的內封題。

其次是二本具有同樣的七篇序。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本收有七篇序，其順序如下：趙士春〈重刻曆體略序〉（1646）、王曰俞〈重刻曆體書序〉（1646）、翁漢麐〈敘〉（1646）、錢明印〈曆體略序〉（1646）、屠象美〈曆體略序〉（1639）、王英明〈曆體略序〉（1639）、王懺〈曆體略序〉（1639）；靜嘉堂文庫藏本亦收有相同順序的七篇序。

此外，就目錄、圖形與各小節內容等來看，二本刊印部份皆逐頁相同。

綜合上述分析，顯示靜嘉堂文庫藏本與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本是相同的，且是目前所知唯二的汲古閣正式刊印重刻《曆體略》本。

（三）靜嘉堂文庫藏本是順治三年刻本，不是明崇禎刻本

根據《靜嘉堂文庫漢籍分類目錄》記載，《曆體略》三卷為明崇禎年間汲古閣刊本。[26] 我們先前得到的結論：「靜嘉堂文庫藏本與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本是相同的汲古閣正式刊印重刻《曆體略》本」。由於二本中有相同的七篇序，其中有四篇撰

24 徐楨基編著，《潛園遺事：藏書家陸心源生平及其他》（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6），頁 111。

25 靜嘉堂文庫編，《靜嘉堂文庫の古典籍：第一回中國宋・元時代の版本》（東京：靜嘉堂文庫，平成六年 (1994)）。

26 日本靜嘉堂文庫編，《靜嘉堂文庫漢籍分類目錄》，頁 456。

寫於順治三年，藉著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本為參照，吾人推論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本是清順治三年本，靜嘉堂文庫藏本亦是清順治三年本，不可能為明崇禎刻本。

但是為何靜嘉堂文庫目錄中會認為它是崇禎刻本呢？崇禎十二年王懺初刻《曆體略》，中有增補子嗣資料的王英明序（1639）、王懺〈曆體略序〉與屠象美〈曆體略序〉三篇序。順治三年五月毛晉汲古閣依照王懺提供的初刊本重刻，所以它刻有崇禎十二年王懺初刻《曆體略》中的三篇序。或許編目錄者見到書中有崇禎年間的序，因而記下。

在現存的十七世紀刊印本中，只有臺北國家圖書館與東京靜嘉堂文庫藏本有這三篇序，而其他六個本只含其中兩篇或一篇，這反映臺北國家圖書館與東京靜嘉堂文庫藏本係目前所知八刊印本中依照王懺提供的初刊本經汲古閣重刻的正式刊本。在臺北國家圖書館與東京靜嘉堂文庫藏本中，王懺〈曆體略序〉尾的印記被抹去（見圖五），原因不明，或許覺得其中有些訊息不妥，才將其從板刻上削除。

（四）靜嘉堂文庫藏本的先前收藏者

在確認東京靜嘉堂文庫藏本是現存順治三年刊印本，且是現存最早依照王懺提供的初刊本經汲古閣重刻的印本，由於靜嘉堂文庫藏本除諸序各有其金石刻印以外，還有一些屬於本書收藏者的刻印，或可循此探討某些先前收藏此本的藏書家。

在趙士春〈重刻曆體略序〉首頁首行，從上到下有「靜嘉堂珍藏」直立長方朱印、「歸安陸 / 樹聲藏 / 書之記」正方朱印與「結一 / 廬藏 / 書印」朱印（見圖二），反映它在轉給靜嘉堂文庫前，歸陸心源所有，之前曾為「結一廬藏書印」的藏書家收藏。

「結一廬藏書印」顯示此書曾為朱學勤（1823-1875）藏書。朱學勤，字修伯，號結一廬主人，清仁和（今杭州餘杭區）塘栖鎮人。咸豐三年（1853）進士，考選庶吉士，歷任戶部主事、鴻臚寺少卿、大理寺卿。政事之餘，喜愛藏書。以家居「結一廬」為名，將其豐富的藏書編為《結一廬書目》。其《結一廬書目》似乎未記載《曆體略》，[27] 但是島田翰在〈皕宋樓藏書源流攷〉中指出「朱修伯」，[28] 靜嘉堂文庫趙士春〈重刻曆體略序〉首頁「結一廬藏書印」，反映此書曾為朱學勤「結一

27 （清）朱學勤藏并編，《結一廬書目》（清光緒二十八年湘潭葉氏觀古堂刻本）、《別本結一廬書目》（民國七年湘潭葉氏觀古堂刻本），收入《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匯刊 近代卷》第 3 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28 （日）島田翰，〈皕宋樓藏書源流攷〉，收入陸心源編，《皕宋樓藏書志、續志》第 1 冊。

廬」藏書，經陸心源家藏，轉入靜嘉堂文庫。

從清順治三年刊刻至朱學勤以前，還有些收藏此一藏本者在書上落印。在〈重刻曆體略目錄〉首頁從上至下有「古淵堂藏書」與「漢陽葉 / 老澧潤 / 臣之印」兩顆正方朱印。（見圖六）前者屬誰不詳，「漢陽葉老澧潤臣之印」為葉名澧印。葉名澧（1811-1859），字潤臣，號瀚源，湖北漢陽人。與葉志詵（1779-1863）皆為清學者與藏書家，兄葉名琛（1807-1859）。道光十七年（1837）舉人。歷任內閣中書、同文館幫辦、玉牒館幫辦、方略館校對、文淵閣檢閱、內閣侍讀，遷浙江候補道，咸豐七年卒於浙江。著有《敦夙好齋詩》與《橋西雜記》。他的書室名稱有「敦夙好齋」、「寶芸齋」、「宗滌樓」、「八萬卷書樓」。[29] 此書似乎是他在浙江候補道任內所藏，後為朱學勤收藏。

書中還有一些印章，卷下頁 20a 有二鈐印，末四行「而景南」三字上似乎蓋有一長方朱印，已不可辨識；在下方「度半至六」上有一長方墨印，也已不可辨識。

（五）靜嘉堂文庫藏本的批註

相對於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本有諸多收藏者閱讀時的圈點，靜嘉堂文庫藏本不多，但是有不少眉批與手注，出自早年的收藏者。

1、在王曰俞〈重刻曆體書序〉中，在頁 3a 倒二行「萬曆四十年」的「四十」右旁，用黑色墨水書寫「歲次壬子」四個小字；在頁 3b 第四行「丙戌」右旁，用黑色書寫「順治三年」四個小字。

2、在上卷頁 4a 上方，有段評語「西曆交中氣，太陽即過宮。此作復十日復九日云云，仍是謬說。」

3、在中卷頁 11a 第五行「房上曰」，在「上」與「曰」間用黑色書寫「九星」。

4、在卷下頁 17b-18a，十二宮部分有一些眉批。在金年宮「婁五」旁，用紅筆寫著「今六」；陰陽宮「昴七」旁，用紅筆寫著「今八」；在「巨蟹宮」末尾，用紅筆寫著「參末今為觜末」；雙女宮「張七」旁，用紅筆寫著「今八」；天蝎宮「亢初」旁，用紅筆寫著「今亢弍」；人馬宮「房三」旁，用紅筆寫著「今心初」；磨羯宮「箕三」旁，用紅筆寫著「今四」；最後在

29 楊廷福、楊同甫編，《清人室名別稱字號索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頁 776；楊廷福、楊同甫編，《清人室名別稱字號索引增補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頁 1566。

> 十二宮結尾，有句「右十二宮度係萬曆甲辰年真數，別見李之藻先輩渾蓋通憲卷上二十九号」，反映批注者讀過李之藻《渾蓋通憲圖說》中的十二宮黃赤道度分資料，[30] 由於歲差的因素，在數值上與李之藻記載有些不同。

這些眉批或手註出自在靜嘉堂文庫購入以前的收藏者，從十七世紀中至陸心源，經歷不止一位的收藏者，不知出自哪一位。從上述第四點中某些眉批資料，參照《渾蓋通憲圖說》中相關資料與其間的差異，或許能幫助吾人推論眉批那些資料者離開李之藻的年代有多遠。

三、東北大學附屬圖書館藏王英明《重刻曆體略》本

東北大學的前身為成立於一九〇七年的東北帝國大學，二次大戰後為消除帝國主義而改名。其圖書館收藏一本《重刻曆體略》，目錄記載其為「三卷二冊，（明）王英明撰、翁漢麐補圖」，[31] 但未標示明確的年代。此一藏本為藤原松三郎購自中國，收有七篇序，其順序如下：趙士春〈重刻曆體略序〉、王曰俞〈重刻曆體書序〉、翁漢麐〈敘〉、錢明印〈曆體略序〉、屠象美〈曆體略序〉、王英明〈曆體略序〉（1939 年增子嗣資料）、王懺跋。本節首先介紹藤原松三郎將它購入日本的歷史背景，接著分析附在書中四項手鈔資料的特色，它們使此書成為一本值得注意的批註本。

（一）藤原松三郎在研究和算史脈絡中購入此書

東北大學藏《重刻曆體略》被收入圖書館的「藤原集書」中，顯示它是日本東北帝國大學理學部數學教授藤原松三郎購入，被列入以其名集成的「藤原集書」中，屬於中國數學史與曆算史的藏書。

藤原松三郎於一九〇五年七月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數學科。兩年後，東北帝國大學創立時，林鶴一（Hayashi Tsuruichi, 1873-1935）為理科主任教授，一九一一年藤原松三郎進入數學科任教。林鶴一是位數學家，在東北帝國大學創立《東北數學雜誌》（*The Tôhoku Mathematical Journal*），也是數學史家，為該校購入許多中國

30 （明）李之藻演，《渾蓋通憲圖說》，收入李之藻編，《天學初函》第 5 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5），上卷，頁 29a-31a（總 1803-1807）。「卷上二十九号」指上卷頁 29。

31 東北大學附屬圖書館編，《東北大學所藏和漢書古典分類目錄》（仙台：東北大學附屬圖書館，1975），頁 245。

數學與和算史書籍，不幸於一九三五年突然過世。

藤原松三郎原先是位數學家，根據他在〈余の和算史研究〉中的記載，在整理同事林鶴一遺留的數學史文集為和算研究集錄時，開始對數學史感興趣。[32] 晚年著重和算史研究，發表三十八篇日本數學史與中國數學史論文，留有日本數學史與中國數學史調查資料遺稿。[33] 他對日本數學史與中國數學史的興趣，引導他留意在日本與海外的和算書與史料。昭和十二至十四年（1937-1939），他獲得帝國學士院與齊藤報恩會的補助，購買外國和算書史料。昭十四至十六年獲文部省科學研究費補助，先後於昭和十五年十月和昭和十六年八月到日本佔據中國東北的滿洲國與中國購買和算書史料。[34] 這些書籍匯集為「藤原集書」，其中包括《重刻曆體略》（見圖八），以文部省補助的科學研究經費購入，昭和十五年（1940）一月二十九日它被編入「藤原集書」第二十號。（見圖九）

綜合上述分析，藤原松三郎晚年對和算史產生興趣，留意中國數學史與曆算史資料，在此脈絡下他從中國購入王英明《重刻曆體略》。

在確認他購入此書後，接著我們想瞭解的是他是否曾使用過此書，進而發表與它有關的研究。根據「藤原松三郎先生の和算研究の文獻」，他似乎尚未發表有關《曆體略》一書的研究，因此吾人不清楚他對此書內容理解至什麼程度。不過有學者還將它與在日本的另一刊刻《曆體略》本進行比較後，在書內留下四項手抄的批註資料，反映此書不但被閱讀，還曾被多次與長期使用，因此這四項手抄批註資料特別值得注意與分析。[35]

（二）此本內四項手抄批註資料

東北大學圖書館藏本具有一些值得介紹與說明的特色。譬如在油墨未乾的情況下就裝訂，使得某些頁碼的由墨會映在對頁上，如王曰俞序首頁、目錄終頁、「九重天圖」、月蝕圖與卷上首頁等。此本的藏印非常少，在藤原松太郎購入此書以前，原刊本中未見任何收藏者的刻印，只在第二冊末尾整理此一刊本時添加的絹紙

32 林鶴一、藤原松三郎、林博士遺著刊行會，《林鶴一博士和算研究集錄》（東京：東京開成館，1937）；土倉保，〈藤原松三郎先生數學史の研究〉，收入藤原松三郎先生數學史論文刊行會編，《東洋數學史への招待——藤原松三郎數學史論文集》（仙台：東北大學出版會，2007）。筆者感謝吉田忠教授幫忙搜尋與提供此二書的資料。

33 平山諦，藤原松三郎〈余の和算史研究・附記〉，收入藤原松三郎先生數學史論文刊行會編，《東洋數學史への招待——藤原松三郎數學史論文集》，頁 85-86。

34 藤原松三郎，〈余の和算史研究〉，頁 79。

35 感謝韓琦先生提供其中三項資料，引起筆者對這個問題的注意。

上有顆朱色「子奇」正方小印。（見圖十）。

東北大學藏本分為兩冊，七篇序、目錄、五幅圖與卷上被編入首冊，卷中與卷下為第二冊。兩冊都加上橘棗色封面，並在各冊前後各加兩張不同於原先刊印紙張的白色半透明絹紙，與封面和封底黏在一起。此書內還附有五張大小不同的白色絹紙，反映藤原松三郎曾參照另一刊刻《曆體略》本的內封題、王懺〈曆體略序〉、卷中首頁內容與卷下首頁內容，再以手抄方式記下，表達他對四項比較資料的看法。茲一一分析如下。

1. 覆寫內封題與上方的註記

一翻開此書的手冊，首先入眼的是此本的內封題。乍見之下，感覺它的線條歪斜與扭曲，粗細不齊，仔細一看，發現它不是刻印的，而是書寫與手繪在後人整理此書使用的白色半透明絹紙上。它是張比一頁來得略小的白色半透明絹紙，浮貼在緊接在趙士春序之前的白色絹紙上，上面有用毛筆以黑色書寫與手繪的內封題。（見圖十一）

由於筆者在東京先看過靜嘉堂文庫藏本有汲古閣繡梓的內封面，以及更早以前目睹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本亦有汲古閣繡梓的內封題，覺得此本像似臺北國家圖書館與東京靜嘉堂文庫藏本一樣，只是它不是出自鐫雕牌記，而是覆寫的，顯示包括藤原松三郎在內的某位收藏者，曾見過具有汲古閣繡梓的內封面鐫雕牌記之刊本，才會覆寫此一內封題。

為了凸顯此本與其參考的另一本《曆體略》間的差異，該位收藏者在內封題上方用紅色墨水手書兩段註記。（見圖十二）茲將其內容引錄與翻譯如下：

> 曾テ明版ヲ見ル同書同板ト認ムベキモ，扉裏ニ下ノ如クアリ。
>
> （我）先前曾見之明版（與此書）應為同書同版，然此書內封有如下題款。[36]
>
> 又書中ニ二ヶ所ノ異ル所アリ，又自序ヲ欠ク，コレヲ補修ス（目錄ノ前ニ來ル二葉）。
>
> 又書中有兩處（與明版）不同，而本書無作者的自序，因此我作了補充（並將自序置於本書目錄之前的兩葉）。[37]

36 筆者感謝吉田忠教授提供這段覆寫日文的英文口譯，並獲鐘翀教授協助覆寫日文標點與中文翻譯。
37 感謝吉田忠教授的英文口譯，以及鐘翀教授協助覆寫日文標點與中文翻譯。

上述引文與手繪的內封面存在以下四點值得注意與商榷之處。

(1)在光照之下可以看到浮貼的白色絹紙與此一藏本原先刊刻的紙張不同。白色絹紙內層有區隔行與行間的暗紋，顯示它是在整理此書時加上的浮貼，不是此刊本刻印時原有的用紙。

(2)引文中的「(我) 先前曾見之明版 (與此書) 應為同書同版」，指的是在對東北大學藏本與該明版《曆體略》刻本進行比較後，判斷東北大學藏本與他先前看過一本明版《曆體略》是「同書同版」，但是並未表明看到的是哪一本明版《曆體略》刻本。

(3)在參考一本明版《曆體略》刻本的內封題後，引文中的「然此書內封有如下題款」，表示東本大學藏本模仿該書刊印內封題，手繪「如下題款」。

(4)引文還提到東北大學藏本與該本明刻版《曆體略》存在兩處不同，「又書中有兩處 (與明版) 不同。」筆者認為其中一處指先前看過明刻版《曆體略》具刊印的內封題，而東北大學藏本則無，因此仿其而手繪與書寫一內封題。另一項則是「本書無作者的自序，因此我作了補充 (並將自序置於本書目錄之前的兩葉)。」換言之，他發現東北大學藏本較他看過的且認為是明刻本少了一篇作者的序，於是他就手抄該序，並將它置於本書目錄之前。

2. 覆寫王犧〈曆體略序〉

過去似乎無人提到此書內有份兩葉的手抄的序，或許閱讀者不懂其內容，或因其夾藏於較隱密之處。在上述引文中第四點曾提到：「本書無作者的自序，因此我作了補充」，顯示這是刻意抄寫的一篇序，而且是東北大學藏本所沒有的。吾人已知《曆體略》的作者是王英明，而此一藏本內已有一篇王英明〈曆體略序〉，因此上述引文中第四點提到「本書無作者的自序」，恐怕有誤。至於「因此我〔覆寫內封面者〕作了補充」，讓筆者留下的疑問是：究竟補充的是何序與在何處？為何手抄者會認為該序是作者的序？是否所抄的本讓抄者覺得那篇像是作者的序？

筆者在瞭解此書手繪內封題上方註記的內容後，曾試著從頭到尾翻閱此書，卻未見任何手鈔的王英明〈曆體略序〉，因此筆者曾一度對手繪內封題上方註記的內容感到困惑，認為其所述不實，可能有誤。很幸運地，在隔日（二〇一三年七月二十四日）仔細逐頁翻閱此書卷上的某書葉時，無意間覺得夾葉中似乎有些紙張，

取出後發現是兩葉覆寫王懺的〈曆體略序〉（見圖十三）。換言之，先前包括藤原松三郎在內的某位收藏者曾覆寫此序，並將王懺誤認為是《曆體略》的作者王英明。

仔細將這篇覆寫的序與順治三年《重刻曆體略》中的王懺〈曆體略序〉（見圖十四）加以比對，內容幾乎完全相同，只有一處有誤，就是末尾處的「崇禎十二年」。原先書寫的是正確的，不知為何成為「崇禎十一年」，「二」字缺了一橫成為「一」，卻在「一」的上方留下一明顯的空處。

3. 關於卷中首頁內容的手鈔浮貼資料

在東北大學藏本的卷中首頁中，有一張細長的浮貼資料（見圖十五），它是以毛筆採紅色墨水用日文手書在一張半透明的白絹紙上，只有十三個字。茲將其內容引錄與翻譯如下：

一本ニ　古澶云云ノ十字ヲ欠ク。
古澶云云十個字在一刊本中未見。[38]

引文中提到的某一刊本，指的是先前提到的明刊本，意謂在先前所見的明本的卷中首頁，發現它缺少了東北大學藏本的卷中首頁第二行的內文：「古澶淵王英明子晦甫譔」十個字。換言之，引文指涉該明本無「古澶淵王英明子晦甫譔」這一行的文字。

4. 關於卷下首頁內容的手抄浮貼資料

類似地，包括藤原松三郎在內的某位收藏者也將先前所見明版卷下首頁內容與東北大學藏本加以比較，在卷中末頁的中央，留下一張手抄的浮貼資料（見圖十六）。它是浮貼在該頁文字上方，約佔六行寬的半透明的白絹紙，寬約三分之二張大，以紅色墨水用中文手抄前三行的資料，並以黑色墨水用日文留下其註記。

從右向左來看，先以紅色墨水手繪先前明刊本卷下首頁右方三或四行的外框，並模仿首三行的格式與內文，以紅色墨水書寫下：

重刻曆體略卷下
　西曆附
　　前所輯皆自古談天成說也，近有歐邏巴人，挾其

38　筆者感謝吉田忠教授的英文口譯，以及鐘翀教授協助覆寫日文標點與中文翻譯。

接著的是一行以黑色墨水與採用日文手書的注記，總共十九字，其上方跳脫了前三行仿先前明刊本所繪的外框，下方則仍在紅色墨水書寫的外框中。

一本ニ右ノ如ク，アソテ譔者名ヲ欠クモノアリ。
右列的文字出現在一刊本中，特別是譔者的名字等未出現於其中。[39]

整張浮貼的內容標示東北大學圖書館藏本與先前提到的明刻本卷下存在兩方面的差異：（1）紅字部分抄自先前提到的明刻本卷下前三行，展現「西曆附」出現在他看到的明版重刻曆體略卷下首頁第二行，而不是東北大學藏本卷下的首行；（2）如同它缺少了東北大學藏本的卷中首頁第二行的那行內文，黑字部分表示該明刻本第二行缺少東北大學藏本卷下第二行關於撰寫者的資訊，也就是缺少「古澶淵王英明子晦甫譔」十個字。

綜言之，在藤原松三郎為東北帝國大學購入的《重刻曆體略》刻本內，留下上述四項手抄資料，使得此一刻本具有汲古閣內封面，只是它不是鐫雕牌記，而是覆寫的，顯示包括藤原松三郎在內的此書收藏者曾見過明刻本汲古閣內封面鐫雕牌記，才會仿其手繪與書寫。其餘三項資料皆在比較明刻本與藤原松三郎為東北帝國大學購入本間的差異。究竟是誰撰寫上述四項資料？它們所參照的是哪一本明刻本？在什麼歷史情境下，做出上述的結果？上述四條手抄資料是否可反映撰寫者對《曆體略》理解的程度？過去似乎尚未曾提出這些問題。

四、藤原松三郎比較日本二藏本並建立其間關聯與顯著差異

由於藤原松三郎於昭和十五年（1940）一月二十九日以文部省補助的科學研究經費購入的王英明《重刻曆體略》，被編入「藤原集書」第二十號，顯示此書應在他掌控範圍之內，直到他於一九四六年過世，也就是二次世界大戰後，才被納入改名後的東北大學圖書館藏。上述四條手抄資料應完成於一九四〇至一九四六年間，從其採用日文來表達的註記來看，應該是藤原松三郎本人比較日本僅有的兩本《曆體略》善本，並建立其間關聯與顯著差異。

筆者雖無直接證據來肯定藤原松三郎在其所藏的《曆體略》中留下上述四項手

39 筆者感謝吉田忠教授的英文口譯，以及鐘翀教授協助覆寫日文標點與中文翻譯，並指出日語引文中的“アソテ”，或許是“アエテ”的筆誤。

鈔資料，[40] 但有以下幾項理由支持此一看法。

依常理推論，東北大學圖書館藏《曆體略》最初就是藤原松三郎購入的，也是他收集中國數學史與曆算史的一本書，他閱讀過此書，並注意和查閱與其相關的書籍。儘管至今未見藤原松三郎留下任何有關他是在什麼歷史背景下寫下上述四項手鈔資料的文獻，可是非常幸運的，吾人可從現存文獻中對此事的發生進行推論。

藤原松三郎晚年從事和算史研究，他不僅使用購入的和算史書籍，為了查閱更多有關和算史的書籍，他曾造訪日本國內許多圖書館。根據他在〈余の和算史研究〉中所述，其中包括東京帝國大學圖書館，「內閣文庫數回」，「岩崎靜嘉堂文庫數回」等等。[41] 換言之，造訪靜嘉堂文庫數回，意謂著他有不止一次的機會閱讀靜嘉堂文庫中的和算史的書籍，當然其中包括該文庫目錄記載「明崇禎刊（汲古閣）」的《曆體略》。當他數度至靜嘉堂文庫，讀到收藏的王英明《曆體略》，根據該庫目錄記載的是本明刊本，將它與他在東北帝國大學購買的藏本進行比較，不難發現二者間存在一些同異，因此而起了比較的想法。

凡是到過靜嘉堂文庫查閱資料的學者，都知道靜嘉堂文庫管理嚴謹，不允許私自照相，也沒有機會於其藏本上留下任何筆墨，最實在的方式就是手抄筆記。藤原松三郎可能首次到靜嘉堂文庫查閱資料時，就注意到該庫收藏的王英明《曆體略》，並作了初步的筆記。回到東北帝國大學後，比對其藏本後，知道二者間存在一些同異。當他下次造訪靜嘉堂文庫時，手邊可能帶著自己購入的那本《曆體略》，將二者置於手邊，建立彼此間的關聯與顯著差異。

首先，在參照靜嘉堂文庫藏本後，發現它有一汲古閣正式刊印的內封題，而東北帝國大學藏本缺乏內封題，於是以黑色墨水覆寫一內封題。

接著，他發現靜嘉堂文庫藏本比東北帝國大學藏本多一篇〈曆體略序〉，於是以黑色墨水覆寫一份兩葉的〈曆體略序〉。並在覆寫的內封面上方以紅色墨水留下其參照某明刻本後，認為其藏本缺少的兩項差異的註記。（見圖十二）

40 一個最直接的證據就是將上述四項手鈔資料與藤原松三郎的筆跡進行核對。由於在東北大學移地研究的時間頗為倉促，當時未曾產生此一想法，有興趣者或可進行。

41 藤原松三郎，〈余の和算史研究〉，收入藤原松三郎先生數學史論文刊行會編，《東洋數學史への招待——藤原松三郎數學史論文集》，頁 83。

曾テ明版ヲ見ル同書同板ト認ムベキモ，扉裏ニ下ノ如クアリ。
（我）先前曾見之明版（與此書）應為同書同版，然此書內封有如下題款。
又書中ニ二ヶ所ノ異ル所アリ，又自序ヲ欠ク，コレヲ補修ス（目錄ノ前ニ來ル二葉）。
又書中有兩處（與明版）不同，而本書無作者的自序，因此我作了補充（並將自序置於本書目錄之前的兩葉）。

第三，他以東北大學藏本為參照，反映靜嘉堂文庫明刻本的卷中首頁第二行缺少「古澶淵王英明子晦甫譔」十個字。

第四，他以東北大學藏本為參照，反映靜嘉堂文庫明刻本的卷下首頁前三行的格式與內文，以及其第二行缺少「古澶淵王英明子晦甫譔」十個字。

整體而言，二善本絕大部分內容是相同的，所以藤原松三郎會表達「（我）先前曾見之明版（與此書）應為同書同版」。至於他發現二本間存在上述四項差異後，可能先記下比較的結果。由於不可能在靜嘉堂文庫藏本上留下任何筆墨，自己購入的那本也是善本，不宜直接手繪或書寫於其上，經過審慎思考後，乃將四項差異以手抄方式謄在準備好的白色半透明絹紙上，並採浮貼或夾頁的方式，以免破壞原書。

這四項手抄資料反映藤原松三郎通過閱讀此二日本藏重刻《曆體略》本，為二本間建立一種相當獨特的關聯，這在書籍的歷史上是相當少見的。在二十一世紀以前，藤原松三郎已對重刻《曆體略》不同的刻本進行比較研究，只是未發表其成果，而是選擇將其結果以手寫方式收入東北大學藏本中，留給後人一些待解的疑惑。這四項手抄資料的第三與第四點，理應記載在靜嘉堂文庫藏的刻本上，受限於不可能在靜嘉堂文庫藏本上留下任何筆墨，只好將其比較結果浮貼在自己的藏本上，留下一些值得玩味的註記，反映他對此書歷史的一些認識與誤解。

從今日的後見之明來看，藤原松三郎似乎未詳細閱讀手邊重刻《曆體略》中的諸篇序，因此不知王英明才是作者，卻將靜嘉堂文庫藏本中的王懺〈曆體略序〉，視為是「作者的自序」，因此大費周章的手抄加以補充。其次，他單純地接受靜嘉堂文庫目錄中記載的「明崇禎刊（汲古閣）」本，認為它是明刊本，[42] 殊不知其藏本

42 在現存八本順治三年刻本中，每本都有崇禎十二年屠象美〈曆體略序〉。如果不參考其他序跋的年代，編目時很可能會選其年代為出版的參考年代。譬如，靜嘉堂文庫藏本的目錄就依屠象美〈曆體略序〉將其藏本年代列為明崇禎年間刻本。

與靜嘉堂文庫藏本序跋中已含有兩藏本皆是清順治三年汲古閣重刻本的訊息。以上兩點多少反映在藤原松三郎當時的王英明《曆體略》研究還處在初起步的階段。

五、結論：追蹤重刻《曆體略》的收藏範圍與此書的歷史意義

書籍的歷史是歷史或科學史研究中一項有趣的課題，它涉及印刷、出版、閱讀、批註與藏書史，與跨文化傳播的文化交流有關。本文追蹤日本收藏兩本王英明重刻《曆體略》就處於從十七世紀前半中西自然知識交流下的成書與出版，至二十世紀前半中日交流下的藏書轉移與對它們的研究。乍見之下，這雖是一個小題，放在長遠追蹤與理解王英明《曆體略》的脈絡中，筆者認為具有以下幾點值得闡明的歷史意義。

首先，本文擴展了追蹤順治三年重刻《曆體略》的範圍。過去的研究集中在海峽兩岸的藏本，似乎未見海峽兩岸以外的藏本，本文追蹤日本兩本順治三年重刻《曆體略》，不但擴展了吾人追蹤王英明《曆體略》的收藏範圍，還可與先前有關王英明重刻《曆體略》的研究進一步結合。筆者認為可將先前的「《重刻曆體略》十一篇序與跋在不同藏本中的收錄分布」表加以擴充，以及為倉促趕工下「一版多本」汲古閣《重刻曆體略》增一案例，可在這兩方面與先前的研究結合，擴延吾人對王英明重刻《曆體略》的研究。

先前研究已知至順治三年王英明《重刻曆體略》，共有十一篇序與跋，以及六本現存的順治三年《重刻曆體略》刊印本，並依時間順序，整理為「現存《重刻曆體略》中的十一篇序與跋的編號、撰寫者、名稱與時間」表，[43] 以及將十一篇序與跋在六刻本中的分布情況，整理為「《重刻曆體略》十一篇序與跋在不同藏本中的收錄分布」表。[44] 如今增添兩日本藏本，使現存順治三年王英明《重刻曆體略》增為八刊印本，如將現存王英明〈曆體略序〉一期最初與後來兩度增添子嗣資料，區分為（1）（1612）、（1a）（1639）、（1b）（1646），吾人可據此二日本藏本將先前的「《重刻曆體略》十一篇序與跋在現存本中的收錄分布」表加以擴充如下。

43 徐光台，〈王英明《重刻曆體略》順治本考證〉，頁 67，表一。
44 同上，表二。

表一：《重刻曆體略》十一篇序與跋在不同藏本中的收錄分布

刊本 / 撰者的序或跋	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本	中國科學院國家科學圖書館藏本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藏本	上海圖書館藏本		浙江大學圖書館藏本	靜嘉堂文庫藏本	東北大學藏本
				殘本	足本			
1. 王英明〈曆體略序〉						v		
1a. 王英明〈曆體略序〉（1639 年增添子嗣資料）	v		v	v			v	v
2. 王懿〈曆體略序〉	v						v	
3. 屠象美〈曆體略序〉	v	v	v	v	v	v	v	v
4. 趙士春〈重刻曆體略序〉	v			v	v		v	v
5. 王曰俞〈重刻曆體略序〉	v	v		v	v	v	v	v
6. 翁漢麐〈敘〉	v	v		v	v	v	v	v
7. 錢明印〈曆體略序〉	v			v	v	v	v	v
8. 王懿跋			v		v			v
9. 吳偉業〈曆體略序〉				v	v			
1b. 王英明〈曆體略序〉（1645 年中秋再增子嗣資料）					v			

先前研究已指出，現存六本《重刻曆體略》共有十一篇序跋，由於順治三年汲古閣刊刻時的緊急趕工，造成現存本無一具有全部的序跋，出現的是一刻多本的情況。本文擬以藤原松三郎藏本中的王懿跋為例，為此增添一個案例。

先前研究指出，在汲古閣重刻《曆體略》時，王懿為重刻此書過程寫了一篇沒有正式名稱的跋。板心位置上方印有「曆體略」，中間為「後序」，因此筆者乃以跋來稱呼它。在這篇跋末尾，王懿提到順治三年五月他於虞山官署完成跋。「歲丙戌夏五月，不肖男懿薰沐敬識於虞山公署。」[45]

不同於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藏本與上海圖書館藏本中的王懿跋出現在書本末尾，藤原松三郎藏本將王懿跋置於該本的上卷末尾。（見圖十七）顯示王懿

45 王懿，〔跋〕，頁 2a。

跋在不同藏本中出現的位置不盡相同，有兩本在書末，藤原松三郎藏本則置於該本的上卷末尾，此一事實印證了在沒有品質管制的情況下，容許王懿與積極參與重刻此書的士人基於汲古閣的刻板，進行略微的調整。於是在一個刻本下產生多本的變異情況，特別是有關它的十一篇序跋在六印本中的分布，造成現存本無一具有全部的序與跋，出現「一刻多本」的重刻《曆體略》，應是汲古閣出版該書過程中諸多偶然因素造成的意外。

其次，本文追溯日本兩本順治三年重刻《曆體略》傳入日本的歷史，說明日本靜嘉堂文庫藏本的傳入是在收購漢籍珍善本的脈絡中，將陸心源藏書整批購入。東北大學藏本則是在研究和算史與中國數學史的脈絡中，由藤原松三郎購入日本。筆者發現藤原松三郎藏本中有四項手鈔資料，認為藤原松三郎通過他多次閱讀靜嘉堂文庫藏《曆體略》本，將其藏本與靜嘉堂文庫藏本比較後，在其藏本中留下以上四項手鈔資料，以讀者身分反映二本間的顯著差異與關聯，為書籍史與閱讀史提供一個非常罕見的案例。

第三，二十世紀中葉以前，除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介紹王英明《曆體略》，將此書歸入天文算法類以外，似乎未見任何進一步研究。譬如，藤原松三郎為了研究和算史與中國數學史而購入其藏本，他除了將此藏本與靜嘉堂文庫藏本比較以外，似乎未對此書進行過研究。

數學家對王英明《曆體略》感興趣，並收藏清順治三年刻本，藤原松三郎不是第一人，較他稍早的章用（1911-1939）曾擁有一刻本。章用，字俊之，湖南長沙人。父親章士釗（1881-1973）與母親吳弱男（1886-1973）都是民國時期聞人。章用在十七歲時重遊英倫，後赴德國哥廷根大學讀數學，肄業於該校數學系。一九三六年回中國，任教於山東大學，後經蘇步青教授（1902-2003）向浙江大學校長竺可禎（1890-1974）推薦，轉往浙大數學系任教。一九三九年英年過世，藏書捐贈浙江大學，其中有王英明《曆體略》。[46] 此書現存浙江大學圖書館，封面上落有「章俊之教授遺贈」藍記直長印記，顯示章用藏本早於藤原松三郎於昭和十五年（1940）一月二十九購入的王英明重刻《曆體略》。

46 現存浙江大學圖書館藏的章用贈本與東北大學圖書館藤原松三郎藏本頗為不同，從表一考看出二者在序跋上的不同。此外，前者似乎不是一個完整本，因為目錄與下卷皆不全，只列到卷下〈黃道宮界〉，缺〈赤道緯躔〉、〈氣候刻漏〉與〈附錄〉等三節，下卷的〈黃道宮界〉也不全，到頁 17a，缺頁 17b-18a。

不過，章用似無機會將其藏本與其他順治三年刻本進行比較，藤原松三郎則是史上首位對日本兩本不同的重刻《曆體略》刊本進行研究者。通過多次閱讀靜嘉堂文庫藏本，確定它與東北大學藏本存在多項不同處。他以手鈔方式記下二書明顯差別資料，將手鈔資料以浮貼或附入方式收入他掌控的藏本中。換一個角度來看，由於他對王英明《曆體略》所知有限，他的重點不在理解此書的內容，甚至誤將王懺〈曆體略序〉視為是「作者的序言」，將靜嘉堂文庫藏清順治三年汲古閣重刻本視為是明刻本，反映當時的王英明《曆體略》研究似乎還在初起步的階段。

第四，目前追蹤王英明《曆體略》的範圍雖擴展到日本，通過 e- 考據與歐洲有關漢學收藏目錄，至今未見耶穌會士收藏順治三年重刻《曆體略》，[47] 反映現存此書的收藏範圍似乎只落在東亞文明圈的範圍內，明末清初時似未引起耶穌會士的注意，筆者認為或許可從外在與內在的相關因素來說明。先介紹外在的相關因素。

由於教王英明西學且與利瑪竇等耶穌會士學習與交往的李之藻已於崇禎三年過世，王英明《曆體略》在崇禎十二年於山西初刻，失去了一個可能將此書向西方傳教士推薦者。再來的是，順治三年汲古閣為王懺重刻《曆體略》，其中只有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本與日本東京靜嘉堂文庫藏本具有「汲古閣繡梓」內封題，帶有崇禎十二年的三篇序，以及趙士春〈重刻曆體略序〉等共七篇序，顯示此二刻本屬於毛晉為王懺而刻的「正式」刊本。一旦出了汲古閣重刻《曆體略》的「正式」刊本，達成了向王懺交差的目的後，毛晉無意對外銷售或傳播此書，因此未將它列名《汲古閣校刻書目》中。由於汲古閣倉促趕工，火速完成為王懺而刻的「正式」刊本後，王懺或參與者陸續發現一些不合時宜的資料需要調整，毛晉容許王懺和參與者增補、略微更動或刪改，另製修改的刻板，以及對序跋的選擇與刷印，於是出現多本彙整不一的刻本。

第五，二十世紀以來，中日近代學者對重刻《曆體略》頗感興趣。藤原松三郎是在和算史的脈絡對王英明《曆體略》感興趣，他的努力多落在比較日本兩本重刻《曆體略》的同異，似乎尚未詳細閱讀東北大學藏本中的諸篇序，遑論對該書內容的探討，多少反映他對王英明《曆體略》研究還處在初起步的階段。過去海峽兩岸學者雖知此書是明末西學傳入後首本中國士人撰寫與天文曆算有關的書，多側重

47 無論是羅馬耶穌會檔案館或是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明清中文善本書目，均未見順治三年重刻《曆體略》。鐘鳴旦、杜鼎克主編，《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臺北：臺北利氏學社，2002）；鐘鳴旦、杜鼎克、蒙曦主編，《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臺北：臺北利氏學社，2009）。

從中西交流史來探討其內容與出處，似乎尚未探討如何理解《曆體略》的內容與意義，這部分屬於此書的內在因素，並涉及王英明撰寫《曆體略》的動機。筆者嘗試通過校釋此書，來理解王英明撰寫《曆體略》的動機，以及此書的內容與意義。

中西科學與文明是兩種迥然不同的傳統，明末首次大規模的西學東漸，使中西兩種迥然不同科學傳統產生大規模的遭遇，其間的複雜性或者可通過中國士人完成的西學著作來反映一二。以王英明《曆體略》為例，他選擇「曆體略」為名稱，以及他是如何將中西相關知識「節略成篇」，反映出這本儒士期許其兒子在科舉考試上有所表現的特殊之處與限制。根據王英明所述，他撰寫《曆體略》的動機在於「為兒子治經之助」，也就是為科舉考試而治《尚書》之用。既然是為兒子準備科舉考試，「書既畢總，秘之帳中，不敢示人」，透露他完成此書的手稿後，只想秘密收藏，不對外公開，遑論出版。[48]

《曆體略》最特殊之處就是王英明以「曆體略」為其書名，究竟「曆體」二字代表什麼意義？在此以前，「曆體」一詞雖出現在大歷體中，代表唐代宗大歷年間（766-779）十位詩人代表的詩歌流派。[49] 此外，似乎未見「曆體」二字出現在書名中。王英明似乎未直接說明「曆體」二字代表的意義，只在其〈曆體略序〉中分別說明「曆」與「體」的意義。對他而言，《曆體略》名稱中的「曆」，指的是君主與儒士共遵的大法與大業。「歷者，帝王經世之洪範，吾儒用世之大業也。」[50]「洪範」指的是治國大法。《曆體略》名稱中的「體」，指的是包括地體在內的宇宙。「體即天體…地體亦天體也。」[51] 也就是涉及西方宇宙論的天體與地體。換言之，「曆體」一詞是將《尚書．堯典》中「欽若授時」的曆法大業與西方兩個圓球式宇宙論中的天體與地體加以結合。他隨李之藻學習西學，可能將曆法的曆與西方兩個圓球式宇宙論中天體與地體的體，做出此一前無古人，至今似無來者的簡略連結。重刻《曆體略》卷下有處記載「述西曆體」，[52] 筆者認為此處指的是與西曆有關的天體地體的知識。

事實上，古希臘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建立兩個圓球式宇宙論，在此基礎上托勒密（Claude Ptolemy, *c.* 87 – *c.* 150/165）提出數學天文學與宇宙的

48 王英明，〈曆體略序〉，收入（明）王英明，《重刻曆體略》。
49 蔣寅，《大歷詩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50 王英明，〈曆體略序〉，頁 1a。
51 同上。
52 王英明，《重刻曆體略》，卷下，頁 1a。

量度，明末利瑪竇等耶穌會士入華傳播兩個圓球式宇宙論與托勒密數學天文學，並在二者的基礎上介紹曆法涉及的天體運行與位置。換言之，宇宙論、數學天文學與曆法屬於不同學科或問題。從利瑪竇等耶穌會士傳播西學的角度來看，他們不會將曆法的曆與西方兩個圓球式宇宙論中天體與地體的體，做出像王英明那般簡略地連結。

第六，在明末西學大規模東傳以前，中西有其各自迥然不同的自然知識傳統，包括不同的自然哲學、星占、天文學與曆算等。明末利瑪竇入華傳教，引入與中國傳統自然知識迥然不同的西方自然知識，使兩種傳統自然知識遭遇，也帶來相互比較、批評、競爭、挑戰與取代等問題，其中西學對中國傳統自然知識的辨偽，筆者稱其為十七世紀自然知識辨偽，[53] 王英明《曆體略》是其中一個值得注意的案例。

王英明無意對外公開《曆體略》，視其為一私密之作，儘管他未說明為何會將曆法的曆與西方兩個圓球式宇宙論中天體與地體的體，做一簡略地結合，筆者認為吾人還是可從西學對此書的重點式影響，來推論與理解他撰寫此書的重要意義。除了接受兩個圓球式宇宙論以外，《曆體略》中另一個重點式影響就是藉西學來批判傳統占候與占星。對王英明而言，由於五星凌犯與與日月交食皆屬於中國傳統的占星異象，西學傳入的兩個圓球的宇宙論，既可用來究明曆法，也可以據此批判或辨偽中國傳統占候與占星。

《尚書 • 堯典》提到堯命當時掌管曆法的羲氏與和氏，敬慎地遵循天上日月星辰的運行，推算出它們的規律，制定曆法，敬慎地依照天時而定的節令告知人民。[54] 依此，在〈曆體略序〉中，王英明想回到《尚書 • 堯典》中曆象的本業。可嘆的是，堯舜的欽若之典，在春秋戰國以降，卻流於後世占候者之弊。「歷之象之，授時急焉。何占候字課以事應。今堯舜欽若之典，為梓慎、裨竈輩借資耶？其流之弊，日官挾國禁以為重矣。」[55] 此外，他採用地心說與兩個圓球的宇宙論，判

53 徐光台，〈從《則草》到《格致草》的四階段發展〉，(明) 熊明遇著，徐光台校釋，《函宇通校釋：格致草（附則草）》（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頁 12-15；徐光台，〈十七世紀自然知識辨偽者熊明遇（1579-1649）〉，發表於「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南港：中央研究院，2015 年 12 月 10-11 日）。

54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漢) 孔安國傳，(唐) 孔穎達疏，《尚書正義》（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之 2）（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卷 2，〈堯典第 1〉，頁 28。「欽若」意謂著敬順。

55 王英明，〈曆體略序〉，頁 1a。

斷占候家所說的四餘，認為那是「與授時無關」的，[56] 並認為「占候家遂配以郡國分野」，也是坐井之見。[57] 卷中首節〈極宮〉中，王英明清楚地表達他將曆書與占候書加以區別。[58] 換言之，追隨李之藻學習西學的王英明，藉著傳入的兩個圓球式宇宙論等西學，對傳統自然知識中星占、分野等提出辨偽的見解。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接受西學中的兩個圓球式宇宙論，還是據兩個圓球式宇宙論來批判傳統占候與占星，王英明似乎亦未提供進一步的推論細節或論述。筆者認為或許吾人可通過對此書的校釋，來了解王英明在這本為兒子準備科舉考試的私密之作中，是如何或以何種思維方式來處理來自中西兩種迥然不同的傳統自然知識。

〔後記〕除了感謝東北大學圖書館與靜嘉堂文庫古籍室服務人員的協助以外，筆者特別感謝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黃一農院士主持的「季風亞洲與多元文化」計畫提供經費贊助，得以前往日本東京靜嘉堂文庫和與仙台東北大學圖書館查閱兩地收藏的清順治三年重刻《曆體略》刊本。承蒙韓琦先生提供東北大學藏本部分資料，東北大學吉田忠 (Yoshida Todashi) 教授協助預先申請與安排，筆者能夠順利查閱該校圖書館藏本。東京的朋友山田俊宏夫婦 (Toshihiro Yamada and Maki) 協助筆者預先申請與安排查閱靜嘉堂文庫館藏王英明《曆體略》，Maki 陪伴前往與幫忙申請拍攝圖片，且將費用殺低，最後寄上圖檔資料與收據，在此一併致謝。關於東北大學藏本內的日文手書註記，筆者感謝吉田忠教授提供英文口譯，以及鐘翀教授協助日文標點與中文翻譯。臺北國家圖書館將其藏本《重刻曆體略》的序至卷上資料提供世界數字圖書館網頁，供讀者使用，本文採用數張圖片，受益匪淺。

56 在〈五緯〉小節末尾處，提到「按曆有四餘躔度，或曰孛生於月遲，紫生於月閏，然係占候運命家言，與授時無關，故黜之。而羅睺計都，前太陰內已見，此不重著。」王英明，《重刻曆體略》，卷上，頁 10a。

57 在〈辰次〉一節「右十二辰分界，從赤道剖之，乃占候家遂配以郡國分野。夫十二次，盡乎天矣。華夏郡國，亦盡乎地耶！多見其為坐井也。」王英明，《重刻曆體略》，卷上，頁 11a。

58 王英明，《重刻曆體略》，卷中，〈極宮〉，頁 1a-b。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漢）孔安國傳，(唐) 孔穎達疏，《尚書正義》（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之 2），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宋）朱熹集撰，朱傑人點校，《詩集傳》，收入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第 1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明）王英明，《重刻曆體略》，上海圖書館藏順治三年足本 (561211、561212)。

（明）王英明，《重刻曆體略》，上海圖書館藏清順治三年刻殘本。（缺中、下卷）

（明）王英明，《重刻曆體略》，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順治三年刻本。

（明）王英明，《重刻曆體略》，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圖書館藏清順治三年刻本。

（明）王英明，《重刻曆體略》，日本東北大學圖書館藏清順治三年刻本。

（明）王英明，《重刻曆體略》，日本靜嘉堂文庫藏汲古閣刊繡梓本。

（明）王英明，《重刻曆體略》，浙江大學圖書館藏本。

（明）王英明，《重刻曆體略》，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清順治三年 (1646) 毛氏汲古閣刊繡梓本。

（明）李之藻編，《天學初函》，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5。

（明）熊明遇著，徐光台校釋，〈從《則草》到《格致草》的四階段發展〉，《函宇通校釋：格致草（附則草）》，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頁 1-15。

（清）朱學勤藏并編，《結一廬書目》（清光緒二十八年湘潭葉氏觀古堂刻本）、《別本結一廬書目》（民國七年湘潭葉氏觀古堂刻本），收入《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匯刊 近代卷》第 3 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清）祁德昌編修，陳兆麟纂，《河北省開州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 年清光緒七年刊本影印。

（清）紀昀等總纂，四庫全書研究所整理，《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整理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

（清）陸心源編，《皕宋樓藏書志、續志》，臺北：廣文，1968。

鐘鳴旦、杜鼎克主編，《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臺北：臺北利氏學社，2002。

鐘鳴旦、杜鼎克、蒙曦主編，《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臺北：臺北利氏學社，2009。

二、近代論著

方豪，《李之藻研究》，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

內藤湖南、田中慶太郎、武內義雄、神田喜一郎、長澤規矩也、吉川幸次郎著；錢婉約、宋

炎譯，《日本學人中國訪書記》，北京：中華書局，2006。

東北大學附屬圖書館編，《東北大學所藏和漢書古典分類目錄》，仙台：東北大學附屬圖書館，1975。

徐光台，〈明清鼎革之際王英明《曆體略》的三階段發展〉，《故宮學術季刊》，2008，26.1: 41-74。

〈明清鼎革之際王英明《曆體略》的三階段發展〉，《故宮學術季刊》，26.1: 41-74。

〈王英明《重刻曆體略》順治本考證〉，《故宮學術季刊》，2010，27.4: 45-74。

〈方孔炤〈崇禎曆書約〉來源新證〉，《自然科學史研究》，29 卷 4 期，2010 年 10 月，頁 404-420。

〈十七世紀自然知識辨偽者熊明遇 (1579-1649)〉，發表於「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南港：中央研究院，2015，12 月 10-11 日。

徐楨基編著，《潛園遺事：藏書家陸心源生平及其他》，上海：三聯書店，1996。

徐楨基，《藏書家陸心源》，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

陳美東，《中國科學技術史．天文學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

陳慈玉，《近代中國的機械繅絲工業 1860-1945》，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

陳遵媯，《中國天文學史》6 冊，臺北：明文書局，1988。

游博清，〈王英明《歷體略》初探〉，《科學史通訊》，30 期，2007，頁 12-20。

楊廷福、楊同甫編，《清人室名別稱字號索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楊廷福、楊同甫編，《清人室名別稱字號索引增補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蔣寅，《大歷詩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靜嘉堂文庫編，《靜嘉堂文庫漢籍分類目錄正續編》，臺北：大立，1980 年據日本昭和 5 年 (1930) 今正續編合冊本複印。

靜嘉堂文庫編，《靜嘉堂文庫の古典籍：第一回中國宋．元時代の版本》，東京：靜嘉堂文庫，1994(平成六年)。

鄭偉章、李萬健，《中國著名藏書家傳略》，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6。

龐乃明，〈晚明時代的河南士人與西學——以王英明及其《歷體略》為中 心〉，《明史研究》，第 12 輯，2011，頁 222-230。

嚴紹璗編著，《日藏漢籍善本書錄》，北京：中華書局，2007。

土倉保，〈藤原松三郎先生數學史の研究〉，收入藤原松三郎先生數學史論 文刊行會編，《東洋數學史への招待—藤原松三郎數學史論文集》，2007。

平山諦，藤原松三郎〈余の和算史研究．附記〉，收入藤原松三郎先生數學史論文刊行會編，《東洋數學史への招待—藤原松三郎數學史論文 集》，2007，頁 85-86。

林鶴一、藤原松三郎、林博士遺著刊行會，《林鶴一博士和算研究集錄》，東京：東京開成

館，1937。

藤原松三郎，〈余の和算史研究〉，收入藤原松三郎先生數學史論文刊行會編，《東洋數學史への招待—藤原松三郎數學史論文集》，仙台：東北大學出版會，2007，頁 79-86。

Gingerich, Owen. *The Book Nobody Read: Chasing the Revolution of Nicolaus,2004.Copernicus*. New York: Penguin. 中譯本見金格瑞契著，賴盈滿譯，《追蹤哥白尼：一部徹底變歷史但沒人讀過的書》，臺北：遠流，2007。

Chasing Wang Yingming's *Li Ti Lue* : On Two Japanese Rare Copies Printed in 1646

Hsu, Kuang-Tai
Emeritus professor
National Tsinghua University

Abstract

Around 1609 Wang Yingming began to learn western learning from Li Zhizhao, who was Zhifu of Kaizhou. Unfortunately, Wang died in 1614 and left his manuscript of the *Li Ti Lue* which was thought as the first work written by a Chinese *literatus* under the impact of western learning. In 1639, his second son Wang Yang was the leading official of Xiangyuan, Shanxi and printed the first edition of the *Li Ti Lue*. After the fall of the reign of Chongzhen and Hongguang, Wang Yang surrendered himself to Qing. He was assigned as Yushi and sponsored the southern area of Yangtze River. In the middle of 1646, he went to Changshu for the inspection of the transportation of grain by ships in that area, under his influence Mao Jin produced the *Chong Ke Li Ti Lue*, i.e., the reprint of the *Li Ti Lue*, in the Jiguge.

Beside following six extant 1646 copies of the *Chong Ke Li Ti Lue*, the author chased two Japanese copies in the Seikado Bunko and Tohoku University, confirmed them as the *Chong Ke Li Ti Lue* printed in 1646, went back to their individual histories of transformation into Japan, and found their connections and prominent differences. In 1907 in its deal with the family of Lu Xinyuan, Seikado Bunko bought a copy which had the same formal title page made in the Jiguge as that of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at Taipei. Since late 1930s Fujiwara Matsusaburo had been interested in history of Japanese mathematics and related fields, in 1940 he purchased a copy. Since then he visited Seikado Bunko several times, he made 4 hand-written items in his copy to reflect the connections and promine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ose two rare copies in Japan. It becomes a very special case in history of publication, book keeping and reading.

Keywords: Wang Yingming, Wang Yang, Jiguge, *Chong Ke Li Ti Lue*, Seikado Bunko, Tohoku University, Fujiwara Matsusaburo

重刻曆體略卷上
古澶淵王英明子晦甫譔
東吳後學
翁漢麐子安甫補圖
王曰俞喜廉甫參定
錢明印文玉甫補註
毛鳳苞子晉甫訂正
天體地形
大圜者上天下地之總名也水附地以成一球。
凝質居中天爲大圜包其外有氣以充實其間

圖 1　靜嘉堂文庫藏《重刻曆體略》上的金石鈐印

重刻曆體略
仲愛王公祖督漕南來一時吳
民拊循甚至政成之暇出其尊
人王子晦先生曆體略一書索
言於余余之德久矣仰青雲覩
白日猶苦作㢑而況登臺露坐

圖 2　「歸安陸 / 樹聲藏 / 書父記」正方小朱印

澶淵王子晦先生撰
曆體略
汲古閣繡梓

圖 3　靜嘉堂文庫藏本內封題

澶淵王子晦先生撰
曆體略
汲古閣繡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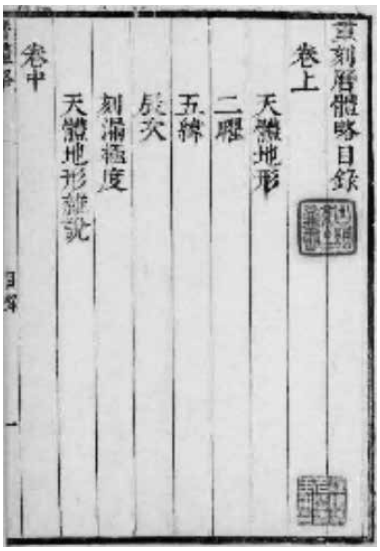
圖 4　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本內封題

不肖斷不敢厚爲先人誣以滋先人戾也謹志巔末以俟

崇禎十二年歲在屠維單閼律中林鍾襄垣令不肖懩

薰沐書

圖 5　臺北國家圖書館藏王懩〈曆體略序〉末頁


重刻曆體略日錄

卷上

天體地形

二曜

五緯

辰次

刻漏晷度

天體地形雜說

卷中

圖 6　「漢陽葉 / 老澧潤 / 臣之印」正方朱印

圖 7　藤原松三郎

圖 8　東北大學圖書館藏《重刻曆體略》

圖 9　被編入「藤原集書」第二十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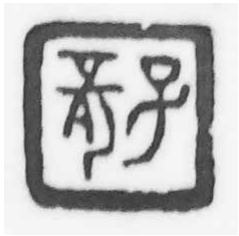


圖 10　先前收藏者的印記

圖 11　東北大學圖書館藏本覆寫內封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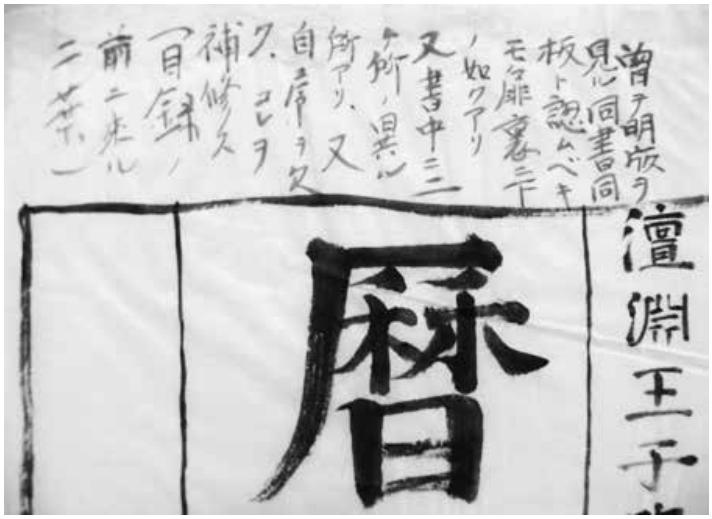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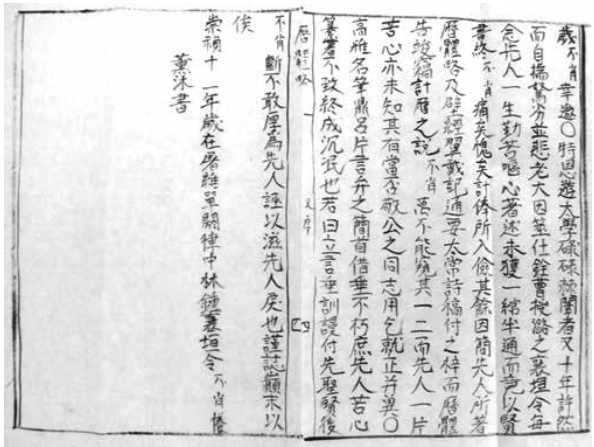


圖 12　東北大學圖書館藏本覆寫內封題上的兩段註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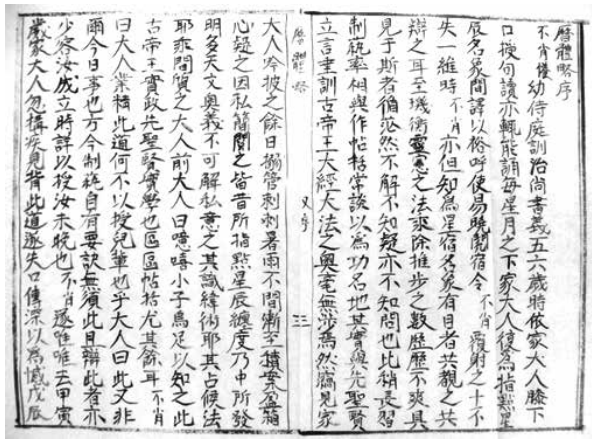


圖 13　東北大學圖書館藏本夾頁內覆寫王懿〈曆體略序〉

曆體略序
不肖儀幼侍庭訓治尚書義五六歲時依家大人膝下
口授句讀亦輒能誦每星月之下家大人復爲指點星
辰名象間譯以俗呼使易曉閱有令不肖覆射之十不
失一維時不肖亦但知爲星宿名象有目者共覩之共
辯之耳至璣衡靈臺之法乘除推步之數歷歷不爽具
見于斯者猶茫然不解不知疑亦不知問也比稍長習
制藝率相與作帖括常談以爲功名地其實與先聖賢
立言垂訓古帝王大經大法之奧毫無涉焉然竊見家
曆體略 叙序 三
大人吟披之餘日獨管刺刺晷南不間斷至積案盈箱
心疑之因私簡閱之皆昔所指點星辰纏度乃中所發
明多天文奧義不可解私意之其讖緯術耶其占候法
耶乘間質之大人大人曰噫嘻小子烏足以知之此
古帝王實政先聖賢實學也區區帖括尤其餘耳不肖
曰大人業精此道何不以授兒輩也乎大人曰此又非
爾今日事也方今制藝自有要訣無須此且辯此若亦
少容汝成立時詳以授汝未晚也不肖遂唯唯去甲寅
歲家大人忽搆疾見背此道遂失口傳深以爲憾戊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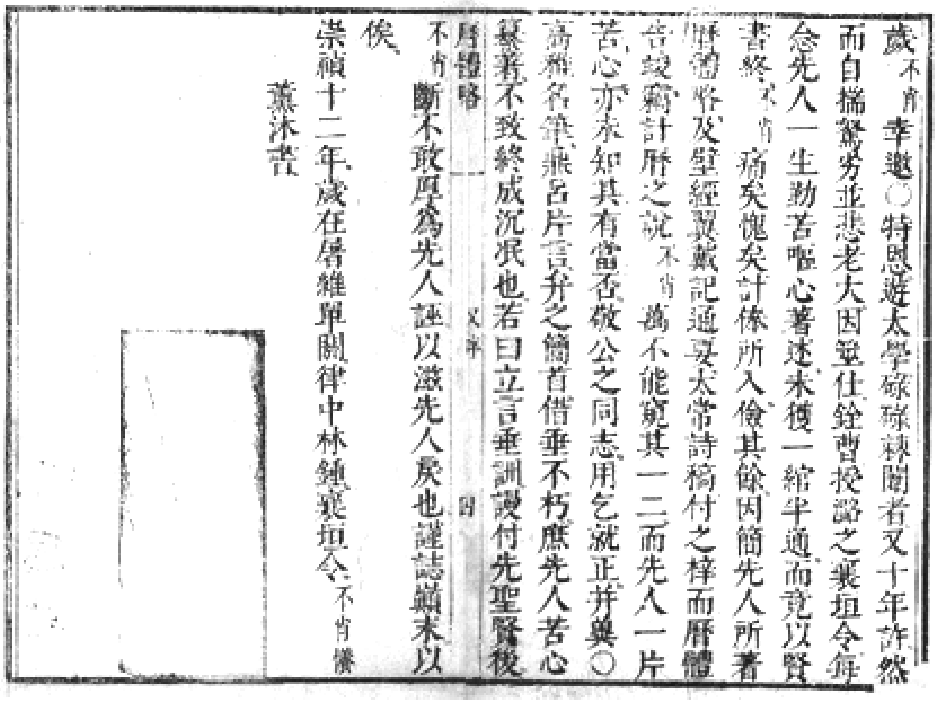

歲不肖幸邀○特恩遊太學碌碌辟闈者又十年許然
而自揣駑劣並悲老大因筮仕銓曹授謁之褢垣令每
念先人一生勤苦嘔心著述未獲一綰半通而竟以賢
書終不肖痛矣愧矣計篋所入餘其餘因簡先人所著
曆體略及星經翼戴記通晷太常詩稿付之梓而曆體
書竊竊計曆之說不肖爲不能窺其一二而先人一片
苦心亦未知其有當否敬公之同志用乞就正并冀○
高雅名筆兼名片言弁之簡首俾垂不朽庶先人苦心
纂著不致終成沉泯也若曰立言垂訓覆付先聖賢後
曆體略 叙序 四
不肖斷不敢厚爲先人誣以滋先人戾也謹誌巔末以
俟
崇禎十二年歲在屠維單閼律中林鍾褢垣令不肖儀
薰沐書

圖 14　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本王儀〈曆體略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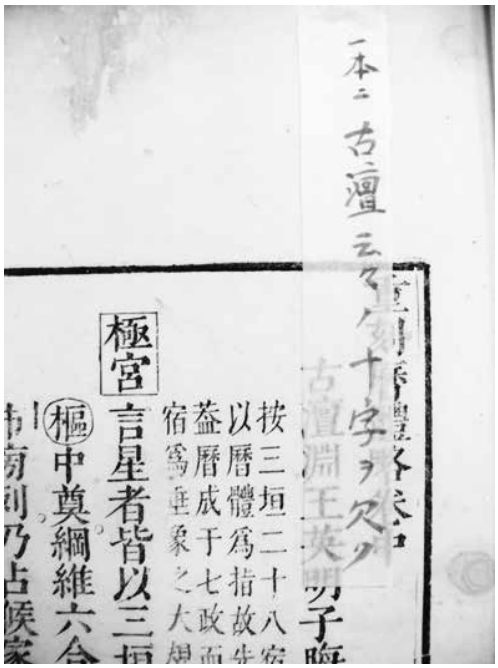


圖 15 東北大學圖書館藏本卷中首頁浮貼的手寫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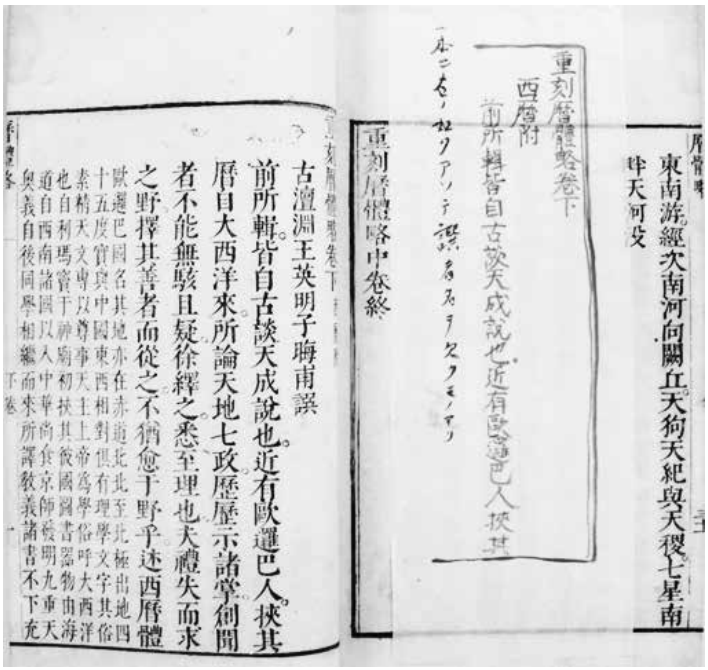


圖 16 東北大學圖書館藏本卷中末頁上浮貼有關另一刻本卷下首頁的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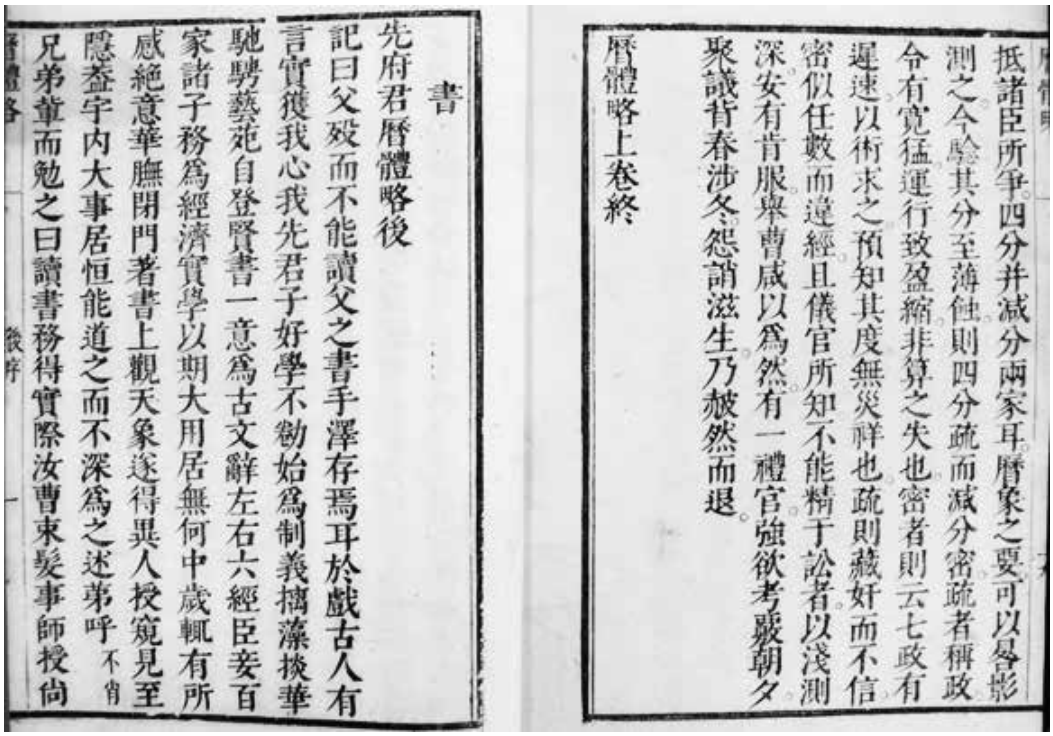


圖 17 東北大學藏本緊接在卷上末的王懿跋